

我的回應

王應棠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助理教授)

2010 年底，寒流來襲的冬季裡有一絲溫暖的訊息正在醞釀。「多元文化教育中心」開幕茶會暨論壇主題：**對部落的重新理解**以對話的方式安排，透過原住民族個人經驗歷程開啟對自身部落的重新理解之路，也許在親情、人情與土地的重重牽連中，可以看見限制與自由的辯證。在個人主義競爭社會的冰冷海洋中，我們開始新的造山運動，讓合作代替競爭，對話取代獨白，關懷先於批判。

我從大學時代一次偶然的機會親身體驗苗栗南庄賽夏族的矮人祭，第一次接觸原住民的生活世界之後，這些年來由於研究及工作的關係，對泰雅、阿美、達悟、阿美、魯凱及排灣原住民的原鄉聚落、生活及文化藝術有深淺不一而切身的實際體驗。這些體驗建立了我對原住民族群在當代社會變遷過程中，諸多現象的理解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拓寬了我的視野，進而改變、深化我的人生經驗。不論對個人或是台灣社會，原住民文化都是珍貴的資產，我衷心期待藉由師生的緊密交流與對話，讓彼此在相互開放、接納、互動和理解的往復交流中相互傾聽，能在對話過程中彼此豐富、拓展生活、學術研究與實踐的經驗。

排灣族戴瑋鉉的〈故事是這麼開始的…〉探究部落族人視原住民公職考試為當代唯一的晉身途徑，讓包括他自己在內的高學歷族人，不論自願或被迫，通通捲進公職考試的「科舉」之路，不達目的壓力就永遠無法解除。考上了，卻由於制度的保障與收入的穩定與提升，成為族人眼中的「部落新貴族」，階級的界線立即形成，對原住民特考旨在返鄉服務，讓在外求學與工作的族人得以親近部落的原初設計卻造成一種拉開階級距離的矛盾。而作者自身也在經過多次考試失敗，並在這段期間逐漸體會父母觀點的社會行程因素後，調整原先排斥報可公職的心態，轉而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回到」準備考試之路。作者語重心長的說：「這次不是為了他們，而是為了我自己，為了自己總是被原住民族考試所擋住的興趣

及夢想，為了希望自己能夠利用自己在大學及研究所的所學，回饋於原住民族，**最重要的是—為了自由**」。我自己對「原住民一窩瘋考公職」此一現象最初的態度是很批判的，一方面是我過去在公部門的工作經驗，讓我對公家機關「不求做好事，只求好做事」的習性產生很大的反感，一方面則是認為這將窄化原住民高學歷者的發展機會，也無助於部落社會多元價值的形成。但在陪著瑋鉉思考的這段期間，我也逐步調整了原先的觀點。也許從更宏觀的角度，當原住民爭取自治成為族群自主發展的戰略時，或許需要更多族人在既有體制中學習此一遊戲規則吧！

而太魯閣族黃薛秋玲的〈看見-風吹藤動 銅鈴動-我的回鄉路〉則在揭開自身多元族群身份認同的層層故事中，透過部落青年會的「代表」身份參與國際事務，而反思自身正被部落拱為「菁英」而逐漸與族人拉開距離的現象。另外，在擔任短期國小代課老師期間，對一位受全班排擠的邊緣學生敞開胸懷，傾聽他和爺爺上山、去墳墓打工的趣事，不以單一的學習成績為依據來對待學生，讓這位學生有機會展現學校之外的生命經驗與自信。將「代課老師」與學生互動的經驗與被其他「正式教師」督促考教職的事情合觀，她質疑當她真的成為「正式教師」這個體制內的成員時，能像「代課老師」時「接住這樣被老師遺忘或是擺放在角落理的孩子嗎」？此一自我反思其實刺破了「多元評量」的學校假面，揭開原住民文化在主流文化的衝擊下，透過義務教育的學習評量遭到邊緣化與漠視的現象。但是這個反思若走到極端，也有「族群自我博物館化」的危險，無視當代的社會文化發展脈絡以尋求曙光與出路，掉進族群文化懷舊與固著化而自我封閉的陷阱之中，只能成為主流社會在強調多元文化時的展演符碼，任人操弄。

透過上面兩篇敘說所開啟的對話，不同族群的人要如何接住這些話題來回應呢？我身為漢族，大部分學術研究與專業實踐是與台灣不同族群的原住民為伍的經驗告訴我，在不同文化傳統的相遇中，除了原住民文化特殊性的吸引，理解異文化更是為了自我理解。正是在對異文化的理解並通過這種理解，我們才能夠對自己的文化和可能隱匿而不為我們所知的那些成見，達到更敏感和更富有批評性的理解。在更廣的社會意義上，相互理解、欣賞並尊重不同文化的存在，則是在邁向民主化的台灣社會必須走的路，這將是一條尋找共同家園的漫漫長路。